



新时代工业文化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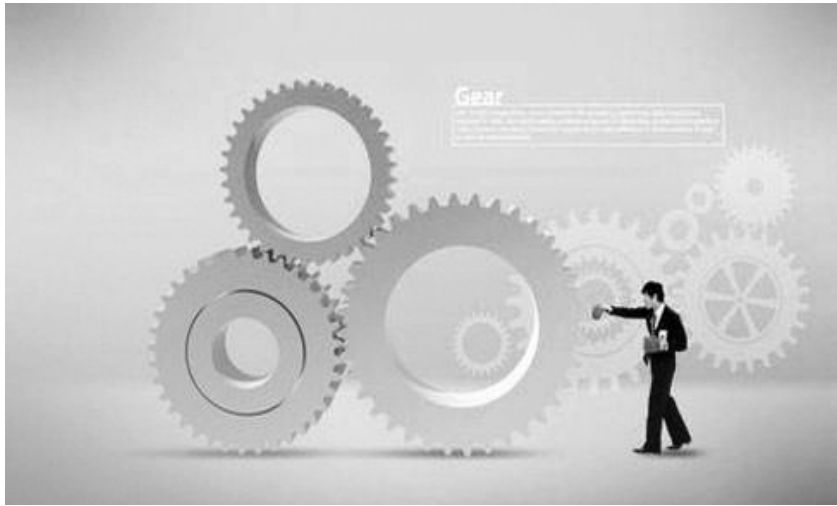
□ 尤 政 黄四民

工业文化是伴随工业化进程而形成的，是工业发展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尽管工业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1882年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著作《快乐的科学》之中，但工业文化在此之前就已形成，例如1851年轰动伦敦博览会的以互换件为标志的美国制造体系，为欧洲国家效仿。此后，工业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

上个世纪的中国虽然也有一些中国特色的工业精神，如大庆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以及工业文化研究，如1962年清华大学刘仙洲教授所著的《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等，但对世界工业发展进程产生影响的工业文化研究还很少。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也应该进入新时代。

中国工业文化研究的新时代可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首先，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提出要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制造文化。2016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与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大力发展工业文化是提升中国工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是塑造中国工业新形象的战略选择，是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有力支撑。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给中国工业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赋予了工业文化研究新的使命。报告中“文化”是高频词之一，出现79次之多，其中很多重要论述都涉及工业文化。这可以通过一些关键词体现，如“创新文化”“企业家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敬业风气”“文化遗产”“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质量强国”，等等。新时代，中国工业文化研究需要承担其新的使命，需要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



业”，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为大幅提升我国工业软实力提供有力支撑。

其次，中国工业正处于由大变强的关键时期。2010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在世界占比首次超过美国，根据不同的统计口径，2012年前后中国该占比超过了20%。如果上述“20%现象”还将存在，那么中国工业文化研究就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机遇期。如何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有待政府主管部门、企业界和学术机构协同合作、努力探索。

再次，信息技术催生了新的文化研究范式。从过去百余年来工业文化相关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其主要研究方法经历了从思辨到实证的演变，从调查数据到大数据的创新。“文化计算”“文化深度分析”“文化学习”“社会学习”等概念不断出现，推动了融合文科视野、理科思维和工科技术研究文化的跨学科发展新趋势。这种新趋势必将给中国工业文化研究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催生工业文化研究的理论创新与发展。

新机遇往往伴随着新挑战。工业文化的发展尽管至少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工业文化研究却一直没有建立起其相应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其相关研究碎片化散落在管理学、工业工

程、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或人类学等学科领域。而在我国，工业文化的概念是近几年才提出和开始重视。工业文化研究碎片化的现状意味着该领域将更具跨学科、交叉性、总体性的特征，因此，工业文化研究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跨学科分类中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研究类型。该研究类型，从整合程度看，需要突破学科疆域，实现知识整合；从参与者角度看，需要学术界与非学术界的共同参与。这种研究类型往往需要以“大科学”的方式进行组织，其组织的复杂性与难度甚至超出研究本身。

成立于2005年的哈佛大学定量社会科学研究院（IQSS）过去近10年在文化相关领域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该研究院院长加里·金（Gary King）教授2014年在《政治学与政治》期刊撰文总结其经验时指出，社会科学正面临着快速的转型。转型中的挑战包括：从研究问题到解决问题；从研究少量的碎片化数据到分析纷繁多样的“大数据”；从依赖单个学者独立研究到大规模、协作式、跨领域和实验室风

格的团队研究；从纯粹的内在学术追求到对公共政策、企业界、其他学术领域，以及社会和个人产生重要影响。同样也面临这些挑战，需要以问题为导向，协同合作，将工业或产业中相关的“文”化为生产力、竞争力和影响力，并最终提升国家软实力。

为应对新时代工业文化研究面临的挑战，我们需要用大科学的思维进行组织和开展研究。我国为深空探测，在贵州省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500米口径的球面射电望远镜；为深海探测，组织实施了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重大研究专项。这些基础研究平台为探索人类未知领域和孕育重大原创发现的前沿科学提供了战略制高点。工业文化的星空大海也有很多神秘和未探知领域。为纪念创刊125周年，美国《科学》杂志于2005年7月公布了125个尚无确切答案的科学难题。其中包括一些与工业文化相关的问题，例如，合作行为是如何演变的？以理解我们的合作精神；为什么有些国家向前发展，而有些国家则停滞不前？以理解发展的不平衡。对更多工业文化神秘和未知领域进行深层次探索，也急需建立跨学科基础平台、交流平台和学术高地，并以此为“透镜”观察和研究工业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文化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工业文化软实力正在超越传统硬实力成为全球竞争力提升的关键。“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推动中国特色工业文化研究和发展，为弘扬中国工业文化、支撑制造强国建设、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作出贡献。

（作者分别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和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副主任）

重“管住大多数”。大量的问题通过红脸出汗解决，注重日常、防微杜渐，让违纪问题止于破纪之初。坚持抓大放小，区别对待、妥善处理，使纪律严肃无情的刚性和关心爱护的温情并存，实现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纪律效果的统一。

“四种形态”是执纪目标。“四种形态”覆盖了党员干部所有可能违纪违规行为和违纪违规行为间的边界缝隙，通过红脸出汗、经常性的警示提醒与批评教育，让党员干部少犯或不犯错误；对于出现轻微违纪行为的党员干部，抓早抓小、动辄则告，及时给予轻处分或组织处理，防止犯更大的错误，甚至滑进违法犯罪的深渊，也就是让第三种形态和第四种形态成为少数和极少数。这种数量和比例关系，是我们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需要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驰而不息的努力。

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四风”问题树倒根存。我们要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目标，还需要在科学运用“四种形态”方面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和实践。

（作者系陕西省纪委监委、省监察厅副厅长）

所针对党员的数量和规模，存在着依次递减的关系。“四种形态”针对治标和治本的双重任务，解决了“抓早抓小”与“查大要案”的关系，治标有效才能治本有道。从纪律上严格起来，以轻处分和组织柔性处理，强化“不想腐”，既体现了惩又体现了治，既是治标之举又是治本之计；以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立案审查等雷霆手段，坚决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强化“不敢腐”，是标本兼治的战略抉择。

“四种形态”是执纪理念。“四种形态”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对违纪行为逐级设防的过程。在“四种形态”中，从第一种形态到第四种形态，其行为性质和量纪程度在层层加重，后一种行为是前一种行为发展的必然结果，后一种形态是前一种形态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前一种形态的工作真正做到了位，就会有有效减少后一种形态问题的发生。

“四种形态”要求执纪审查工作要从注重“盯违法”向注重“盯违纪”转变，实现“以纪律人”和挺纪于前，完成纪法既相互分开又相互衔接的法纪观塑造，是一种宏观上的执纪理念。这既体现了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又体现了对党员的关心爱护、宽严相济，既注重“惩处极少数”，又注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 黄承伟

攻坚战的着力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脱贫攻坚。新年伊始，在全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脱贫攻坚进入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深入四川凉山深度贫困地区调研，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了新的动员令，为全面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行动纲领。

强化政治责任，这是全面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的基础。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我们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贫攻坚已经成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带领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的一把手工程，是一项极其重大、极为严肃的政治任务，更是各级党政干部义不容辞的重大政治责任。只有从政治高度深化思想认识，深化政治责任，深化使命担当，才能不断夯实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政治基础。

坚定信心决心，这是全面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的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出发，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党中央不断加强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全面领导，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从责任、工作、政策、投入、帮扶、社会动员、考核评估等七个方面，建立形成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为全面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在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中，积累了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证，坚持精准方略、提高脱贫实效，坚持加大投入、强化资金支持，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量，坚持从严要求、促进真抓实干，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等六条弥足珍贵的经验，为全面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提供了方法路径支持。

坚持基本方略，这是全面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的核心。坚持精准扶贫方略，就是坚持精准扶贫的目标标准，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绝对贫困；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稳定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既不能降低标准、影响质量，也不要调高标准、吊高胃口。继续完善建档立卡，深入推进精准施策，扎实做好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就业扶贫、危房改造、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等重点工作。聚焦深度贫困地区，精准着力化解特殊贫困群体难题。精准识别分析存在的问题，精确分析问题成因，准确采取针对性措施解决问题。严格考核评估，强化脱贫成效。

转变工作作风，这是全面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的关键。党中央已经明确，将2018年作为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扎实开展扶贫领域作风建设。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落实好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坚持问题导向，集中力量解决脱贫领域“四个意识”不强、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措施不精准、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工作作风不扎实、考核评估不严格等突出问题。强化扶贫资金监管，健全公告公示制度，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完善阳光扶贫、廉洁扶贫机制。对发现的作风问题，举一反三，完善政策措施，加强制度建设，扎紧制度笼子，切实将作风建设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

培育内生动力，这是全面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的根本。打好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人，在人的观念、能力、干劲。一方面，抓好各级扶贫干部学习培训，着力提高并保持其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动力。通过培训，帮助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提高思想认识，树立正确政绩观，掌握精准扶贫方法论，提高研究攻坚问题、解决攻坚难题的能力；帮助基层干部，切实提高精准扶贫实际操作能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主体作用。加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励和引导贫困群众自力更生，努力改变命运。改进帮扶方式，提倡多劳多得，营造勤劳致富、光荣脱贫氛围。

（作者系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主任）



『四种形态』的认识

深化对监督执纪

□ 杨政国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党在纪律建设方面的重大理论创新，为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开展监督执纪问责，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法规依据和工作遵循。进一步深化对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认识，以便在实践运用中更加精准。

“四种形态”是方法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认识对待违纪违规问题不同发展阶段的方式方法，是当前执纪机关开展监督执纪问责应遵循的一般性原则。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揭示的原则符合违纪行为发展的一般规律。违纪问题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开始出现违纪苗头时，处于第一种形态的处置范畴；如果没有及时提醒教育，就有可能出现较为轻微的违纪行为，从而进入第二种形态；如果仍没有及时发现处理，就有可能出现较为严重的违纪行为，也随之进入第三种形态；对于已经出现严重违纪行为，还是没有发现并给予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就有可能出现违法犯罪行为，滑进犯罪深渊。

“四种形态”针对党员干部违纪行为的共性规律，解决了“量的积累”与“质的变化”的关系，描绘了从提醒式的批评教育到纪律处分、从违纪到违法的梯度轨迹，给出了由轻到重的因应之策。与此相应，“四种形态”

提升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

□ 郑 琦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全面从严治党要在国有企业落实落地，既要充分发挥党委（党组）的领导作用，又要有效调动基层党组织的积极性。在自上而下层层传导党建压力的同时，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使基层党组织在企业一线真正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教育党员的学校、攻坚克难的堡垒。

服务生产经营不偏离，提升基层组织发展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服务生产经营不偏离，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检验党组织的工作和战斗力。”国有企业中的基层组织大部分位于企业生产经营一线，党组织负责人也以兼职居多，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下，更需要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有机结合。基层党组织要打破党

务、业务分割的惯常思维，将党建工作融入生产经营的各环节之中，做到党的工作与业务工作同步谋划、同步开展；上级党组织在检查或考核过程中，也要充分体现党务与业务的融合，不仅要开了几次会、搞了几次活动作为基层组织党建工作的评价指标，更要着眼于党建工作，是否提高了广大党员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是否促进了企业业绩的提升等。国有企业中的基层组织只有将自身的党建工作融于企业生产经营之中，真正推动了企业的发展，党建工作才能体现出自我价值，基层组织也才能为自身在企业中的发展赢得更大的空间与更多的资源。

加强自身建设不放松，提升基层党组织自我革新力。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有赖于自身建设的不断加强。一方面严格落实各项制度。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坚持“三会一课”制度，习近平总书记也专门提出企业党组织“三会一课”要突出党性锻炼。国有企业的基层党组织要把“三会一课”作为组织生活的基本形式与载体，在内容上突出党性教育与党性锻炼，在管理上从紧从严，让广大党员在参与过程中切实增强党员意识，提升党性修养。另一方面推进活动方式创新。基层组织需要结合党员的特点，开展灵活多样的组织活动，着力突出组织活动的仪式感、参与感和成就感，激发出党员参与党组织活动的内生动力。

仪式的作用在于传递出一种身份认同，基层组织可以将交党费等日常工作尽可能设计得严肃、庄重，突出活动的仪式感，在活动中增强党员的身份认同。参与的作用在于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基层组织可以在活动方式上给党员更多的自主权，让党员成为组织生活的“主角”，最大限度地调动党员的参与热情。成就感是要让党员在参与的过程中感受到被尊重、被认可以及个体的价值实现。这一方面来源于活动本身的意义，不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的特意为之，而是真正能够或者试图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也来源于基层党组织的宣传与引导，挖掘日常生产经营工作中所蕴含

的意义与价值，从易于被党员认可、接受的角度切入，使党员认同工作的价值，进而自觉在其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关注职工需求不间断，提升基层组织政治引领力。国有企业中的基层党组织要想成为广大职工群众的“主心骨”，就需要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既讲道理，又办实事，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引领力。一方面关注并回应职工需求。从过去较多要求职工做什么，转向更多关心职工希望做什么、需要什么上来。尤其是正视广大职工的物质性需求，理解在激烈的企业竞争中，广大职工对工作环境、薪酬待遇

以及个人发展的高度关注，并利用基层党组织的资源优势积极予以回应。另一方面引领更高层次的政治追求。十九大报告专门提出基层党组织要“突出政治功能”，避免在服务的过程中弱化了组织的政治属性。国有企业中的基层党组织在回应职工需求的同时，需要不断拓展自身的政治功能，从政治的角度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围绕政治认同做文章，将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第一时间传达到位，把广大职工的思想认识和认识凝聚到中央精神上来；赋予平凡的工作以崇高的意义，把广大职工的智慧和力量聚集到企业的各项工作中去，使广大职工在日常的工作中有价值感、有实现感。与此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身边党员的实际行动教育、带动广大职工，一同寻求更高层次的价值实现，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力。

（作者系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党政制度教研室副主任）